

## “卡农”与徐志摩

“卡农”是一种曲式的名称,特征是间隔数音符不停重复同一段乐曲。我推崇的配乐《卡农》则是帕赫贝尔创作的一首变奏曲,又作D大调《卡农》,它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卡农》。《卡农》曲长5分钟,算是微不足道的小品,旋律简单朴实,但结构精密,一般以大提琴启奏,三把小提琴间隔八拍后依次加入,拉奏相同的旋律,低音部则由八个音符组成同一旋律,从头至尾重复28次。

徐志摩留下约280多首诗作,其中有歌咏爱情的,有写景状物的,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我独爱其爱情诗,在塑造爱情柔美的艺术形态之外,丰富的意象里还透露着人生的单纯信仰,这是徐志摩对理想人生的不放弃。诗歌的音乐性对中国新诗而言无疑是一个历经反复讨论却又始终无法完全解决的论题。而谈论诗情则无需这么谨慎和麻烦,诗和情总是适宜与音乐遥契的,例如我来北京了,喜欢在失落时听肖邦,喜欢在下雨天坐在飘窗上听kiss the rain,喜欢在深夜听马友友,迷茫沮丧时喜欢用两部低音炮只加一个副高音主箱听《出埃及记》……如果可以把徐志摩的爱情诗视作是他理想人生憧憬的艺术表现,他对理想伴侣和纯粹爱情的追求,似乎是他衡量理想人生完成度的最重要方面,而这全部的诗情,似乎都在谱写一曲“卡农”。《卡农》像极了朦胧而又富有信念的情诗,它不像浪漫派作品那样高潮迭起、惊心动魄,只在反复平常的进行中交相共

## 前奏

林徽因到英国的时间。林徽因是随父亲林长民由沪抵法转英国的,他们到英国的时间,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在《徐志摩生平史事考订》一文中给出了相对具体的日期,即他们乘坐的航船,1920年4月1日由沪开航,航行36天,于5月7日抵马赛,如果路上不耽搁,第二天即可到巴黎,因此最快5月9日即可抵伦敦。这个时间与陈学勇先生收入《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中的《林徽因年表》,基本上吻合,《林徽因年表》在1920年这条下:“4月1日,林徽因随林长民由上海登法国邮船Pauliecat去伦敦,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等至码头送行。……5月7日,邮船抵达法国。约5月中下旬,到伦敦,寓Rortland旅馆。”(陈学勇:《林徽因年表》)。林长民赴英,是因为其为“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代表。“国际联盟协会”1918年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北京成立了中国分会,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英代表的身份参加过此协会。

徐志摩到英国的时间。徐志摩1918年8月14日离沪赴美,9月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读书,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攻读硕士学位。1920年9月24日离美赴英。10月上旬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不久,认识陈源,并与英国作家威尔斯、魏雷等结交。

1920年11月26日徐志摩致父母信:“即今纷媾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儿自到伦敦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趣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智能。”(徐志摩1920年11月26日致父母信)徐志摩催促张幼仪出来是早已商量的事,他父母也同意,只是还没有正式付之行动,并且徐志摩说,他自到伦敦以来,性灵顿开,求学兴趣更浓,更喜欢与英国名士交往。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抵伦敦后,自1920年8月7日起,林徽因随父亲往欧洲大陆游览,至9月15日返回伦敦。9月20日,林徽因考入英国St.Mary College学校,23日开始上课。

1920年10月,刚抵达伦敦的徐志摩是好奇而新鲜的,欧游回到伦敦不久的林徽因是孤独的,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感受着伦敦的秋天。

10月5日,林长民赴欧洲大陆(从林徽因后来的信中知道应该是去瑞士国际联盟),林徽因独居伦敦,她的孤独无法排遣。关于这段独居生活,多年后林徽因有过回忆:

好比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顶大的饭厅(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闹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上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纠纷。(林徽因1937年11月9—10日致沈从文信)

根据《林徽因年表》,林徽因在英国

# 徐志摩爱情诗与“卡农”之漫谈

□赵 依

鸣,而平凡的韵律却隽永了瞬息万变的生命底色,同一旋律以同度或五度等不同的高度在各声部先后出现,造成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模仿,一个声部的曲调自始至终追逐着另一声部,直到最后……最后的一个小结,最后的一个和弦,它们会融合在一起,永不分离。

我常想,这种总体上趋向平和温暖,其间又有无数天地纵横、神鬼相依之默契的基调,是不是就是徐志摩的理想人生及其映射之爱情?徐志摩当过主声部,也当过副声部,主旋律顺利过,也做过倒影处理,纵然开始再甜蜜,中段再默契,结尾处却总是少了最后一个和弦,不是主声部未奏,就是副声部未鸣。徐志摩痛苦于这种感觉,写下极富灵性的诗句,有的出乎直抒胸臆,有的源于刹那的情思与幻觉,他的爱情逼迫他做出多少甘苦的尝试,他的诗歌便有多少起承转合的形式,徐志摩对现代白话诗表现手法的丰富,其灵感几乎是来自理想与现实、理想爱情与现实姻缘的错落,他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情感羁绊,既成就了他,也给他以终生都走不出的精神困局。好在徐志摩的性格算得上越挫越勇,芸芸

众生,一起长大、一起变老,真正需要的只是那么一次演绎的机会,双眸几间,锁不住脉脉情感,他的爱情诗和《卡农》一样,适合父母子女、夫妻、或苦恋多年的情侣来演绎,那种对完美默契孜孜不倦的追寻则是最关键的那个“核”……

## 爱情与爱情诗

毫无疑问,徐志摩的爱情诗,以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构思、清新秀逸的意境、细腻委婉的抒情、动态的美和理想的光辉、多样的艺术表现方式等特质拔萃出类。然而,学界对徐志摩爱情诗的评价不一,争论的焦点不外乎其诗歌属性和思想内涵。

先说诗歌属性,茅盾在《徐志摩论》中指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这一说法颇有拥趸,认为徐志摩的许多爱情诗并不是真正的情诗,而是“披着恋爱的外衣”或假“恋爱”写“单纯的信仰”。徐志摩曾坦言自己的部分诗作乃生活“波折的留痕”(《猛虎集》序文),这自然是说他的

(都是先生的好话),并且康桥那方面几个老朋友我也认识几个,他那文章里所引的事,我也好像全彻底明白……(林徽因某年某月某日致胡适信)

林徽因当时在伦敦,为什么对徐志摩的事这么熟悉、对康桥这么有特殊感情,还不是因为徐志摩,还不是因为和徐志摩相恋,这才如此难忘。

关于康桥的“晚春”,时间大致在六七月间,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里提到,英国是几乎没有夏天的,那么六七月至少6月完全还可以看作是晚春。这个时间,林父不在伦敦,林徐沉醉在康桥的晚春景色里,沉醉在爱情的迷恋中,一点不错,她才会对康桥这么熟悉,这么有着特殊的感情。

因为与林徽因的相识相恋,徐志摩才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1931年8月出版的诗集《猛虎集》的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这段恋情、理解他从理想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而转变为诗人同样有帮助:

整整十年前我吹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都占定了;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徐志摩:《猛虎集·序》)

这段话,这些特别的意境,林徽因也曾回应过:

他为了种特异的境遇,一时特异的感动,从此在生命途中冒险,从此抛弃所有的旧业,只是尝试写几行新诗……这些,还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寻常能够轻易了解的神秘。(林徽因:《悼志摩》)

另外一次,林徽因说得也许更明白:

我们仅听到写诗人自己说一阵奇异的风吹过,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个惊讶,一次心灵的振荡,便开始他写诗的尝试,至于意境文学音乐的搏斗,但是究竟这灵异的风和月,心灵的振荡和惊讶是什么?是不是仍为那可以追踪到内心直觉的活动;到潜意识后而错综交流的情感与意象;那意识上理智的感念思想;以及要求表现的本能冲动?奇异的风和月所指的当是外界的一种偶然现象,同时却也是指它们是内心活动的一种引火线。诗人说话没有不打比喻的。(林徽因:《究竟怎么一回事》)

这内心活动的引火线,也正应了徐志摩的话:“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

因为这件事,导致徐志摩成为诗人,也间接地引发了后来的空难,所以后来谈到康桥英文日记时,林徽因说: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了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痛苦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提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 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难,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林徽因致胡适信)

时过境迁,对于当年恋爱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

关于这段恋爱史,凌叔华是清楚的,一则凌叔华是徐志摩的知己,徐志摩什么秘密都讲给她听,再则,她受徐志摩所托,保管过八宝箱且看过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晚年凌叔华回忆:

他(指徐志摩)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

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本来在他叠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了掉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的,都埋没或遗失了。(凌叔华1982年10月15日致陈从周信)

虽然时间相隔很久,但林徐相恋这些事凌叔华是清楚的。陈学勇先生在《林徽因与徐志摩“恋情”考辨》(陈学勇:《才女的世界》)一文中,提到几个人,如陈岱孙、陈意、冰心等,都否认林对徐会产生恋情,并说凌叔华认定林徐谈过恋爱,只有凌叔华的说法出现偏差,事实上,偏偏只有凌叔华是知情人。

我不明白的是,因为对方才华出众,一个女子倾情于他,这又有什么错?后人非要替他遮掩这个事实,公平吗?是不是没有这些林徽因才是完美的?但是人总是不完美的,何以这样苛求?何况,她这样的不完美在普通人眼中已是很完美了!

## 背景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林徽因有没有可能对徐志摩产生爱慕之情,也就是林徽因对徐志摩产生爱情的背景因素是否存在。回答是肯定的。

摩的爱情诗,有的写对爱情的憧憬和对真挚爱情的追求,有的写热恋中的焦灼和失恋的忧伤苦痛,有的写得到爱情的欢欣满足和深情被摧残的愤懑凄恻,还有的直接写情趣……所有这些,构成徐志摩爱情诗的思想内涵,既不乏表现个性解放者,也的确有就爱情写情趣者,不可一概而论。

窃以为,徐志摩爱情诗成就之最高,还在意蕴充盈之美学境界。徐志摩的知识结构,一方面汲取西方诗艺的优长,另一方面又继承中华古典诗词传统,因而得以在融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其爱情诗除在总体上呈风格清新、音节和谐的美学特质,还不至于意境美、柔情美、含蓄美和忧郁美。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虽然新月社以闻一多倡导的“格律诗”著称于世,放之于徐志摩,却没有严格的“三美”主张,他在《艺术与人生》中说道:“我们没有艺术,正因为没有生活”,“人生的贫乏必然导致艺术的贫乏”。正是由于徐志摩有着为爱活、为爱死的生活勇气,他在诗歌境界的塑造上才层出不穷又卓有成效,特别是在诗的形式上,追求诗的“分行的抒写”和“浓得化不开”,在爱情诗里尤为突显。

不懂诗歌的人也能读懂徐志摩,诗情真实,诗意浓烈,兴奋与低落一再交错,各种情绪喷薄,很好读懂,也不难体悟到某种超越意义上的美——原来,诗和《卡农》通篇都是一个男人跟一个无所谓意象与否的女人说道“爱你”,她跳到她眼前的那一下,我们读到了第一行的首字、听见了第一个音符,再往下,我们知道生活被唤醒,竖琴开始演奏……

林长民让林徽因读的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让林徽因从小接触到西方文化,并且受到正规教育。她自己也这样说:

你们知道,我是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接触与活动对我是不可少的。(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

双重文化影响下的林徽因,早已不是一个旧式女子,她对金岳霖的爱情也可说明这一点。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收入《林徽因文集》中的几封书信,其中惟一一封致金岳霖的信写于1943年,信末落款是“徽寄爱”,而她1953年写给丈夫梁思成的两封信,落款仅是“徽因”,那么几十年前,当她还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时候,对一个心仪的男子产生浪漫的爱情也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林徽因一度陷入感情危机,对此她有很多感触:

过去我从没想到过,像他那样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道路如此不同,竟然会有我如此熟悉的感情,也被在别的景况下我所熟知的同样的问题所困扰。(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信)

这话颇耐人寻味,“如此熟悉的感情”,说明她自小生活的旧式家庭,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这种非一般的感情也是寻常得很。

同时,林徽因在伦敦,身处浪漫主义发源地的英国,这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上面提到的这种:

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林徽因1937年11月9—10日致沈从文信中)

她等着有个人来爱她,正好徐志摩来了,她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进去。

## 丛刊2016年第11期目录(总第208期)

文献史料研究	周作人日本《中国文学》月报中的周氏兄弟	小林基起
1939年周作人日记	陈凌虹	王应平
徐卓呆留日经历及早期创作活动考	王应平	王应平
《民立报》的俳谐文	吴小美	李丹梦
作家与作品	孙淑芳	孙淑芳
谈谈老舍的文论	孟觉	孟觉
谈谈老舍的文论	黄爱	黄爱
谈谈老舍的文论	朱永富	朱永富
谈谈老舍的文论	陈尔杰	陈尔杰
谈谈老舍的文论	李相银	李相银
谈谈老舍的文论	裴亮	裴亮
谈谈老舍的文论	陈晓明	陈晓明
谈谈老舍的文论	杨光祖	杨光祖
谈谈老舍的文论	杨荣昌	杨荣昌
谈谈老舍的文论	朱静宇	朱静宇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电话:010-57311619/57311618